

★ ★ ★

党外人士眼中的毛泽东

宋庆龄眼中的毛泽东

“伟大事业的引路人”

□ 聂文婷

宋庆龄是孙中山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她赞同孙中山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的观点，即便在孙中山逝世后，她仍坚定地“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继续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以实际行动书写了“永远和党在一起”的荣光一生。通过亲身经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宋庆龄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创造伟业，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有毛泽东这样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

“思想敏锐，识见远大”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当时很多人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诚意，也极为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但毛泽东却以“弥天大勇”毅然决然作出决定：“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毛泽东认为，当前国内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存在的所有迫切问题，都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因此，重庆谈判的根本目的是为解决国内阶级矛盾，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全中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同时，对于到重庆后可能出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情况，毛泽东也有充分估计。毛泽东坦言，谈判必有一定程度的让步，但让步要有底线，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临行前，毛泽东还未雨绸缪地提出了谈判过程中我方让步的具体预案，“如果这些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毛泽东对时局的深思熟虑和对危险的凛然相视，鲜明体现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重大历

史关头积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应对风险挑战的责任担当。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分别于8月30日上午访晤宋庆龄，于9月6日晚出席了宋庆龄举办的宴会。关于此次会见，毛泽东在1949年6月19日给宋庆龄的信中真挚地写到：“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对贤者的尊敬之情，跃然纸上。此次会面，也给宋庆龄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她后来回忆在重庆的初次会见，评价毛泽东“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言语之间，道出了毛泽东高瞻远瞩而不拘泥眼前、顾全大局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伟大领袖品质。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胜利”

1949年筹建新中国期间，毛泽东多次至诚邀请宋庆龄北上，希冀她能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6月19日，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毛泽东亲笔致信宋庆龄，并“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面对如此真诚的态度、恳切的盼望，宋庆龄最终于8月26日乘火车从上海启程前往北平。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到北平车站欢迎宋庆龄。当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宋庆龄。随后，宋庆龄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诚然，宋庆龄前往北平，不仅是因为毛泽东的谦恭有礼、精诚所至，更是因为宋庆龄在跟随党的事业的过程中，建立了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完全信任。正如宋庆龄在1949年2月20日《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信中

所言：“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这一章历史，始于1921年毛泽东等人所肩负的开创天地之伟业，其间经历了“蒋介石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遗训，背叛了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却负起了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重担”。接下来便是一段长期而又艰苦的斗争历程，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继续发扬和学习革命前辈的英勇斗争精神，“继续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信心百倍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对于这一章历史，宋庆龄还以亲历者的身份作出总结：“我们的成就应该直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1949年7月1日，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宋庆龄满怀激情地“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并称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领导者”，实际上也表达了她对毛泽东英明领导的高度认可与坚定拥护。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毛泽东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作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同时还为党和人民留下了永志后人的崇高精神风范。对此，宋庆龄由衷敬佩，认为毛泽东“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是勤奋好学的典范。毛泽东在书中学，读古今中外的圣贤勇士之著述；毛泽东还在实践中学，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做好调查

研究，同时结合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形成了大量具有持久广泛影响力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因此也可以说，毛泽东是通过创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指导我们更好做事的典范。关于这一点，在宋庆龄看来：“在探索中国当前有关政治的、生产的或其他任何事务的实质中，毛泽东主席著作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不可否认，我们不能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找到对所有具体问题的回答，“但书里有许多地方谈到在困难面前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以及怎样加强克服困难的决定，怎样用革命意志把头脑武装起来，并敢于显示人在任何事情上的决定性作用——这就是从毛主席著作中所获得的动力”。

此外，宋庆龄之所以称赞毛泽东，还因为毛泽东言传身教于我们该如何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宋庆龄赞扬中国共产党30多年来给中国人民以模范的领导，其中一条就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她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一向教导我们，在成功的时候必须保持谦逊态度，这样才能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这里，宋庆龄表示了她对毛泽东“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真理的认同。再将此融入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宋庆龄更深刻体悟到保持谦虚的态度，“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出自内心地尊重所有其他一切国家的人民，不论他们是我们的近邻，还是在世界的另一边”。一路走来，宋庆龄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极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实质与毛泽东统一战线政策中所体现的宽广胸怀、包容境界、团结智慧形成了强烈的实践共鸣。

中央苏区如何做好选举大会记录工作

□ 徐佳佳 谢志斌 黄 艳

通过召开选举大会选出合适的代表，是苏区群众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做好选举大会记录工作不仅能够促进苏维埃选举工作规范化，还能为查询核对会议内容、准确执行大会决议等提供一手文件参考。因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选举大会记录工作，从建立大会记录管理机构、依法规范大会记录工作流程、统一大会记录格式等方面做好这项工作。

建立大会记录管理机构。我们党高度重视文书档案的记录、管理、保存等工作。在党组织早期重要会议中，毛泽东、瞿秋白等都承担过大会记录工作。大革命之后，秘书制度逐渐完善，各级中共党组织召开的工作会议、早期基层苏维埃召开的代表大会和各委员会会议、各级群团组织召开的工作会议，都会提前安排秘书人员做好大会记录工作，并用专门的文件箱保管这些文件。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临时中央政府要求开展新一轮的苏维埃选举运动。选举大会的记录工作看似只是苏维埃选举运动中的一个小环节，但能否做好这项工作却关系到选举大会流程是否合规等问题。因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积极汲取之前党政群团做好会议记录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明确了这项工作的管理机构，其中，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就规定各项文书、印刷等秘书事务统一交由各级苏维埃的总务处（部、厅）负责。根据这一规

定，苏维埃选举大会的记录工作由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统筹，其下属的总务部门是这项工作的具体管理部门。这一机构设置让只在选举期间开展的选举大会记录工作有了常态化的管理机构，为这项工作的规范化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依法规范大会记录工作流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临时中央政府在1931年和1933年分别颁布了一系列选举法律文件。这些法律文件对苏维埃选举大会记录工作的记录人、归档等做了明确规定，确保了苏维埃选举大会记录工作的各个环节环节有法可依。

首先，依法明确选举大会的记录人。选举大会的记录工作政治性、专业性都很强，需要一位得到选民公认且有足够专业水平的工作人员担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以下简称《细则》），规定选举大会记录工作由选举大会推选的书记担任，“选举大会的主席团由三人组成之，两人由选举大会推选，其余一人则为选举委员会的主席或全权代表，并另选书记一人，以担任选举时的记录”。这一安排在1932—1933年上半年的苏区选举运动中得到执行。但为了提高效率，1933年8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苏维埃暂行选举法》，对选举大会记录人产生办法做了略微修改，将原来的推选机构调整为选举委员会。

其次，依法明确选举大会记录工作的确认手续。苏区的法律文件对哪些人及采用何种方式在选举大

会记录上确认，都做了十分详细的规定。其中，《细则》就规定苏维埃选举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和书记都必须在会议记录上签字，“选举大会的记录，必须主席团的全体及书记签字”。之后颁布的《苏维埃暂行选举法》在《细则》相关规定基础上，将“盖章”增加为确认的另一种方式，与“签字”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再次，依法明确选举大会记录工作的归档流程。苏区法律文件对这一工作也有严格规定。其中，《细则》规定：“选举大会的记录、到会登记表及一切与选举有关的文件，都汇送选举委员会。”待各级选举委员会收集齐之后，苏维埃选举大会的记录等文件将被转交给相应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备检查”。而根据《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苏维埃选举大会的记录等文件将最后由各级总务机构具体保管，完成选举大会记录工作的闭环管理。

统一大会记录格式。为了加强对选举大会记录格式的统一管理，提高选举大会记录工作的效率，1931年11月后临时中央政府安排内务部印制了标准化的《选举大会记录》，为各地做好选举大会的记录工作提供统一文本参考。目前，古田会议纪念馆、江西省博物馆等均保存了《选举大会纪录》。其中，保存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的共有3页，每页长29厘米，宽31厘米。文本首页标题为“选举大会纪录”6个大字。标题下方为选举大会的基本信息栏，包括时间、地点、参

会人员数量、与会负责人确认处等。在填写这些基本信息时，记录人只需要在固定条目的空白处填上即可，十分方便。

大会基本信息填完后，记录人需要书写“议事日程”，包括“选举委员会主席（或全权代表）根据宪法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报告宪法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规定”“选举正式代表”“选举候补代表”等。这部分内容的书写是对《细则》第25条选举大会议事日程规定的回应。其中，为了更好地呈现“议事日程”中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的选举过程、结果，要求记录人填写6张表格，即“选举正式代表”“正式代表候选人付表决的结果”“主席宣布正式代表当选人名”“选举候补代表”“候补代表候选人付表决的结果”“主席宣布候补代表当选人名”。这些表格制作规范，要求填写的内容十分详细，记录人按要求填写后，阅读者就能直观、真实、全面地了解选举大会的主要信息。

此外，讨论表决选民和苏维埃代表的提案也是苏维埃选举大会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选举大会纪录》在“议事日程”中还要记录选举大会上收到和讨论的提案，“通过选民交给代表带去的提案”。为了增强会议记录的严谨性，《选举大会纪录》在文本末尾还要与会相关负责人再次签字或盖章确认。按照上述要求和规范填好《选举大会纪录》后，一份完整、准确、真实记录苏维埃选举大会情况的文书就形成了。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北山公园内，矗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纪念碑。纪念碑重新修建于2016年，坐北朝南，高24.13米，宽3.85米，碑基、碑座由花岗岩砌成，碑身用钢筋水泥铸就，碑顶立一尊左手持枪、右手投弹，呈站立姿势的战士铜像，碑身正面刻有“牡丹江抗日战争暨爱国自卫战争殉难烈士纪念碑”21个钨钢拉丝字，碑座上部刻有“1947.9.18”金色数字，是为了纪念在战争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牡丹江市党政军民于1947年9月18日在北山脚下立下此碑。数字下方刻着遒劲有力的楷体金色《牡丹江抗日战争暨爱国自卫战争殉难烈士纪念碑铭》，全文如下（标点为引者所加）：

溯自九一八日寇侵华，蒋贼不抵抗政策，将东北河山拱手让敌，牡丹江父老横遭蹂躏十有四年。我东北民族优秀儿女为不当亡国奴，组织群众、组织武装，高举抗日义旗，出没白山黑水之间。尤以抗日联军在中共领导下，于十四年悠久岁月中，洒热血、抛头颅，旰食宵衣、忍饥耐寒，尝尽人间艰苦，奋勇苦斗，未尝稍息。杨松、周保中将军等，曾率抗联健儿驰骋疆场，在我牡丹江地区，两克宁安，建立根据地，予敌东部战略基地以致命打击。优秀共产党员一路军三方面指挥陈翰章将军及王光宇、于洪仁、王汝起等同志壮烈殉难，创成抗联英勇史诗。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联协同苏联红军对日反攻，与八路军、新四军会师，解放东北，庶几中华民族得庆独立、和平、民主而慰先灵。不幸蒋贼代替汪逆，勾结美帝国主义，使东北沦为殖民地。我东北军民激于爱国热忱，起而自卫，大战四年，四下江南，血染松花江，歼敌数十万，遂使蒋、杜贼军处于四面楚歌，濒于绝境。而我牡丹江后方清剿敌匪，歼灭国特，苦战宁古塔，血洒牡丹江，皆为我牡省牺牲烈士可歌可泣之杰作。

综观我英勇军民，为国爱民，殒命监牢，血染法庭，被俘不屈，杀贼戕身，多少无名英雄殉难于祖国，大节英名，树民族之正气，丰功伟绩永垂不灭。

为悼先烈之英，告慰九泉之灵，继承其遗志，不忘先烈之血迹，刻石树碑，永垂千古，又为之铭曰：血洒丹江，还我河山，终歼顽敌，无愧英烈。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牡丹江省党政军暨全体人民敬立
二〇一六年九月重刻
秦德昭书

碑文记录了牡丹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和4年解放战争，谱写出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英雄颂歌。读来令人心潮澎湃，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白山黑水 英雄辈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国民党不抵抗政策，整个东北沦陷。牡丹江人民白手起家，积极建立武装，纷纷举旗抗日。同年11月起，宁安县委扩建为中心县委，领导宁安、穆稜等县抗战；牡丹江建立中共吉东局，“反日自卫队”等被改造为党在牡丹江的基本武装力量。

1932年2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刚一踏入牡丹江，就遭到牡丹江抗日武装的迎头痛击。原宁安保安总队队长刘万奎率1800多名自卫队员三面包围海林镇，向日本佐佐木司令部驻地发起进攻，日军遭到突袭，狼狈逃窜。这次战斗，打响了牡丹江地区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的第一枪。紧接着，半年多的时间，日本侵略者就占领了牡丹江的主要城镇，牡丹江人民开启了全面顽强的抗日斗争。同年9月，著名抗联将领周保中临危受命，指挥救国军和安图、桦甸的抗日武装进攻驻守敦化的日军，激战两昼夜，摧毁敌人的城防工事，歼灭日军后移师宁安。次月起与陈翰章以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血洒牡丹江 丹心照日月

——牡丹江抗日战争暨爱国自卫战争殉难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赵旭康 健 许亚萍

及于洪仁浴血奋战，力克宁安县城，给宁安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此后，抗联武装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11个军的建制，部队最多达数万人。他们转战于牡丹江的山川大地，与日寇一次次展开殊死血战。英勇机智的优秀党代表于洪仁深入抗日队伍，做宣传、强组织，不幸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年仅26岁。

1937年七七事变后，牡丹江彻底成为日军经济封锁、思想奴化、军事剿杀的战略重点。为冲破日军铁壁合围，打通与南满抗日武装的联系，1938年4月，中共吉东省委决定以抗联第四、五军为主力，开始西征。西征部队在补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与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奋力拼搏，在抗日斗争史上，留下悲壮的一页。

1940年10月，吉东、北满省委决定战略转移，抗联主力进入苏联休整，小部分坚持分散战斗，牡丹江抗日斗争陷入低潮。抗联部队经过几年休整，军政素质大为提高。1945年8月，抗联部队在苏联红军的支援下，歼灭牡丹江城中日本关东军4万余人，日本帝国主义被赶出牡丹江。14年艰苦抗战，终于迎来胜利。

巩固政权 艰苦创业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调集8个主力师10万余人，大举进攻南满解放区，企图先占领南满，再进攻北满。东北民主联军和南满军区共三个主力纵队，按照“南拉北扯”的战略，进行南北配合作战。

1946年12月17日起，我军三、四纵队与国民党在临江附近交战。为应援南满作战，1947年1月5日，牡丹江人民在北满民主联军带领下，开启了一下江南的征程，首次越过冰冻的松花江，采取“一点两面”的战术，迫使国民党军抽调4个师北援，有效地支援了南满。经过反复拉锯作战，2月20日，北满军第二次越过松花江，开始二下江南作战，三纵队配合南满军作战，胜利保卫临江。在北满部队回江北休整时，国民党军调集2个军兵力，准备过江北攻，我北满军迅速反击，于3月8日第三次越过松花江，击溃国民党军。持续3个多月的三下江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个师，毙伤1.9万多人，俘虏4万多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南满解放区的攻击，从而加速了东北解放的进程。

牡丹江人民在应援南满的同时，也在后方展开了与土匪的斗争。追缴国民党残匪的两年多时间里，著名剿匪英雄杨子荣一举将匪首“座山雕”活捉，创造了深入匪巢、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不幸的是，他在继续追剿残匪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1岁。